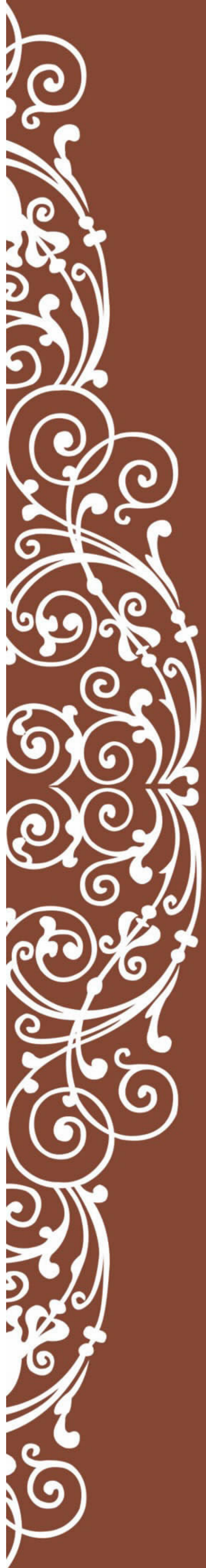


改革中的历史教育

GAIGEZHONG DE LISHI JIAOYU

冯一下◎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中的历史教育 / 冯一下著. —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408-4845-3

I. 改… II. 冯… III. 历史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9656 号

责任编辑 胡宇红

封面设计 毕升

版式设计 顾求实

责任校对 左倚丽

责任印制 黄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mm×240mm

印 张 34.5 插页 4

字 数 553千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自序

本书为历史教育研究论文集，主要反映我2002年—2007年的研究心得，编排为史学范式更新与历史教育改革、“历史课程标准”解读、历史教材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反思、历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高考历史命题改革探索等辑。因收入书中的论文和文章多写于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时，且以历史课程改革为探讨的核心内容，故书名为《改革中的历史教育》。从内容、风格、形式和成书时间看，可视为2002年结集出版的《历史教育新探》（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续篇，相较而言，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本书都有新的拓展。

在整理书稿过程中，不免又一次回忆起自己的历史教育研究之路。

1962年夏，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的一所中专工作，学校领导让我教语文。其实，课程表上安排的中共党史课与我所学专业是很对口的，我主动表示可以上这门课。但因党史课属于政治类课程，而我“出身”不好，领导婉言谢绝。从此，我成为学校语文教研组的一员，边教边学。“文化大革命”末期要“复课闹革命”，但风传全国的中专都不再办了，我被调到一所普通中学。起初仍教语文，以后又教地理和政治，直到1977年秋天。在这十五年里，我虽远离历史教学，但对史学的兴趣依旧。工作之余，读一些史书，摸索着搞一点史学研究，重点是秦汉史。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对于历史教育研究来说，深厚的史学功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以后的历史教育研究过程中，我一直重视历史教育内容研究，应该说与这一时期的积淀有很大的关系。

1977年末，高考恢复，我开始正式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干了五年后，又做了两年历史教研员。对我来说，这七年的经历十分重要，一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教学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又促使我顺理成章地走

自序

上了历史教学研究之路。1980年，发表在《历史教学》上的《试谈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是我研究历史教学的第一篇文章。这时，距我大学毕业已18年了。搞历史教育研究，我的起步是相当晚的，而且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恐怕也迈不出这一步。1983年，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在成都召开年会，因地利之便，我得以出席，并向大会提交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和《历史教学中的美育》两篇论文。我在大会上的发言，获得与会者好评。会上会下，我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同行。当时已成名的历史教学研究专家、北京教育学院赵恒烈先生还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愉快的交流、认真的讨论，加深了我对历史教育研究的认识，增强了信心。此后，我下的功夫更多了，成果也逐渐多起来。这一时期，因兼任四川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历史知识》的编辑，处理了很多中学历史教师的来信来稿，使我对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为满足第一线历史教师的需要，我主编了《中外历史分类学习纲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一书，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专题结构的历史知识体系，对全国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中历史复习教学）影响很大，至今还有同行不时提起此书。

1985年，我调到成都成人教育学院工作，除搞一些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哲学和行政管理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而以讲授行政管理学的时间最长。这样一来，历史教育研究又成为“副业”了，但我始终坚持着。每年都参加成都市中学的一些历史教研活动，都出席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都发表三两篇历史教学研究论文。更重要的是，在第七、八两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我先后参加九年义务教育大纲本历史教科书（内地版）与义务教育课标本历史实验教科书（川教版）的编写，并主编了《成都历史》。这样，历史教材改革便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1995年，以发表《普通高考历史命题改革述评》为新起点，我又重新研究起历史高考来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全国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师）的兴趣，密切了我与他们的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我接触和探讨了中学历史教育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历史教育研究的路上行进着。1999年，年满60岁的我在成都教育学院（现并入成都大学）退休，职称为副教授。没有了上班的劳累和“创收”的重负，除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包括旅游）外，还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思考、研究、写作，顿感轻松愉快。在出版了《历史教育新探》，主编了《现代化的进程与启示》（三联书店出版）后，我又开始了对新课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方面是历史课程改革、史学范式更新对历史教育改革的影响、历史教学反思、历史高考命题改革走向等。每年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均在20篇上下，五年的总数超过百篇。这一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成果最多的时期。收入本书中的篇章主要是从这一时期的文章中选出来的。

以上是我走过的路，以及留在路上的一些脚印。

我一直在西部地区的基层工作，自认为是“草根”类型的历史教育研究者。回顾走过的研究之路，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感慨良多，体会良多，就其大者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认准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

回顾以往的经历，我深深感到对人的一生来说，认准目标，坚持不懈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实在是太重要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的欲望和想法也很多。如果今天想干这样，明天想干那样，到头来恐怕是一事无成。无论是从事历史教学，还是从事历史教育研究，注定清苦一生。如果可以重新安排人生，我肯定不会再选择这一行。但是，既然“命运”已让我今生与这种清苦工作结缘，那就好好干下去吧。时至今日，虽不能说取得什么成绩，但毕竟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机会，多多少少进行了一些研究，至少可以说，后半生没有白活。

二、奠定坚实的基础

回顾以往的研究经历，我深深感到坚实广博的基础是从事历史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初，每一次领导安排我去上一门非历史的课程，我都会因“专业不对口”而抱怨，现在看来，却是“因祸得福”。特殊的工作经历迫使我钻研了语文、政治、地理、哲学、行政管理学等多门非历史专业的学科，奠定了较为广博和扎实的基础，为历史教育研究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应该说，起步很晚，进展较快是我的研究历程的特点之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时期的知识的储备。完全可以说，没有那些非历史学科的教学经历，很多文章是写不出来的。比如，我写的《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两个应摒弃的虚假概念》一文，就得益于行政管理学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教学，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一文的写作则得益于讲授行政管理学中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会。没有教过行政管理学，我恐怕写不

出这类文章。多年讲授政治课和哲学课，使我熟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多年的语文教学则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这对历史教育研究的好处就更多了。

三、发挥特长和优势

研究的过程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在从事历史教育研究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了解自己的长处和优势，知道了自己的短处与不足。比如，与一般的中学历史教师相比，我的理论水平似乎要高一些，而和大专院校从事历史教育研究的同志相比，我的实践经验又要多一些。又如，和大多数历史专业出身的同志相比，在非历史专业知识方面，似乎我又要多一些。简言之，我认定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上，在跨学科的综合上，自己有一定的优势，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就尽可能地发挥这种优势。学习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研究则要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1. 发挥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的优势

当选定教学反思作为研究课题、初步了解相关知识后，我首先是回顾以往的历史教学实践和历史教科书编写实践，对若干具体问题（包括教训和经验）进行反思，写成若干篇小文章。接着，总结反思心得，从理论上加以提升，探讨教学反思的启动机制、基本环节、反思成果表达形式等理论问题。又如我研究历史高考，既涉及相关理论，探讨命题改革的走向和规律，又大量设计试题（尤其是材料解析题），因而成果受到第一线历史教师和文科班学生的广泛欢迎。

2. 发挥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联系较紧的优势

历史教育改革，尤其是历史教育内容的改革，必须依托史学研究的成果。由于我一直关注并搞了一些史学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在选择历史教育研究课题时，我注意了发挥这一优势。比如研究史学范式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我实际上是把自己所了解的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影响日隆、运用越来越广的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等运用到中学历史教学中来，并介绍给广大中学历史教师，目的在于促进中学历史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更新。

3. 发挥跨学科综合能力较强的优势

和一切学术研究一样，历史教育研究贵在创新，贵在提出和解决新问题

题，就历史教育论历史教育很难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或交叉处着眼，则可以发现很多新问题。

当我将美学和历史教育结合起来时，提出了历史教学中的美育问题，认为进行审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并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后来，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改和历史课程标准制订时，都接受和反映了这一研究成果。

当我将思维科学与历史教育结合起来时，对历史思维的实质、过程、特点等有了更深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近来，当我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和历史教育时，发现以往我们由于忽视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产生了一些片面影响。如讲罗斯福新政时，只重视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严重经济问题，而忽视了这次危机所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了我们对罗斯福新政内容与特点的把握。有鉴于此，经研究后我提出中学历史教学要注意历史上的重要社会问题。

四、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以往的经历使我体会到，作为历史教育研究者，必须重视学习。年轻时如此，年纪大了也应该如此。就学习和研究的关系而言，学习是第一位，研究是第二位。从本质上看，研究过程就是学习过程，研究的成果是学习的收获。

学习历史，一是要向书本学，二是要向生活学。

向书本学，首先要读经典。因我喜欢秦汉史，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自然较多。其次要读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反映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近年，我读樊树志先生的《国史概论》《晚明史》等专著，收获颇多。

向生活学，除了多走走看看外，关键是要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去，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把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了解和认识联系起来，以新的眼光审视历史、解读历史。我赞赏西方现代史家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觉得这种看似片面的说法中包含着深邃的哲理。近年，我谈论现代化范式和文明史范式对历史教育的影响较多，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认识的产生起初并非来自相关的史学著作，而是来自生活，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

自序

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现实促使我去思考史学范式更新的意义和影响。又如，最近我提出了历史教学要重视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的观点，这也不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本身引起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以及党和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针、政策，促使我去梳理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总结前人应对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学习的意义，一是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二是用新的东西激活头脑中的“库存”，让其以鲜活的形式释放出来，变为研究的成果。一旦学习和研究良性互动，自己的认知水平就会越来越高，获得的成果就会越来越多。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未来的历史教育研究之路还有多长，自己也无法预测。但我想，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在多多享受晚年生活乐趣的前提下，还会慢慢地走下去吧。改革开放的时代给了我研究的机会和条件，应加倍珍惜。把有限的余热给予自己的兴趣和一生钟爱的事业乃是一种幸福。

目 录

第一辑 史学范式更新与历史教育改革	/ 1
“两个任务”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 3
“耶鲁演讲”对历史学习的指导意义	/ 9
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 13
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典型剖析	/ 23
社会生活现代化素描	/ 30
“三个文明”与中学历史教学	/ 40
政治文明：政治史教学的新视角	/ 50
整体历史观与历史教学	/ 57
历史教学应重视历史上的社会问题	/ 65
第二辑 “历史课程标准”解读	/ 77
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政治史内容	/ 79
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经济史内容	/ 89
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文化史内容	/ 98
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人物史内容	/ 108
高中历史选修课程设置的创新	/ 119
过程即目标论	/ 128
关于“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几个问题	/ 139
第三辑 历史教材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 145
历史教材中德育要求的体现	/ 147
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	/ 155
历史教材的体裁应该多样化	/ 161
历史教科书呈现方式的再创造	/ 165

乡土历史教材改革势在必行	/ 172
试论教师在教材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179
略谈新编内地版初中历史教材	/ 186
一套特色鲜明的历史实验教科书	/ 194
第四辑 历史教学反思	/ 201
“基于惊异”的历史教学反思	/ 203
要慎重地选择和使用图像	/ 216
要注入新的观念	/ 218
要准确地诠释历史文献	/ 221
要注意历史的复杂性	/ 224
合理使用“夏商周年表”	/ 227
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光辉先驱	/ 230
略说1936年的中国经济	/ 234
试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	/ 238
读懂洛克	/ 242
明治维新的时间下限	/ 244
聚焦三个时段 透视“世纪之交”	/ 248
林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	/ 251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辨析	/ 256
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主要趋势的再认识	/ 259
第五辑 历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 263
试论历史学习方式及其变革	/ 265
深入研究学生的学习方式	/ 276
研究学生心理特点 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 279
幽默感是提高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 286
画龙定要点睛	/ 291
海外中小学历史教育片谈	/ 298
第六辑 高考历史命题改革探索	/ 305
国家高考综合科目应该正名	/ 307
文科综合测试的理论与方法	/ 310
史学范式更新与高考历史试题改革	/ 326

现代化进程史：历史高考的新重点	/ 333
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主线进行历史复习	/ 337
走进文明史	/ 344
对文明史教学的建议	/ 352
重视交往史的复习	/ 363
京派与海派：高考历史全国试题与上海试题比较研究	/ 367
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高考命题改革的互动	/ 376
自主命题背景下历史复习教学的基本策略	/ 385
面对历史高考重大转换的理性思考	/ 394
材料解析题面面观	/ 405
材料解析题设计札记	/ 415
对高考历史问答题的认识论审视	/ 427
极具开发价值的能力类主题	/ 434
方法类历史试题的特点、类型与解法	/ 438
社会问题：历史高考的新内容	/ 443
开阔视野与创造性思维	/ 447
高考历史试卷试题选评	/ 452
我国高考历史命题改革的先行者	/ 466
第七辑 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研究	/ 473
战国后期至秦朝四川地区民族融合的基本趋势	/ 475
我国农业税的产生与早期演变	/ 486
试论汉宣帝对吏治的整顿	/ 492
汉代吏禄透视	/ 500
司马迁的教训	/ 504
大月氏历史述略	/ 508
诸葛亮与科技	/ 512
雪白的银子与黑色的鸦片	/ 518
试论抗战历史的价值及其开发利用	/ 523
中国近代著名科技实业家的成功之道	/ 530
后记	/ 540

第一辑

史学范式更新与历史教育改革

史学范式是史学观念、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的有机集合体，它对历史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局性的。长期以来，阶级斗争史范式主导着我国的历史教育。这种状况是否应该改变？应如何改变？对此，作者下工夫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形成如下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社会主义物质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今天，在全球化趋势十分明显的当代，我们应更多地关注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和社会史范式等史学范式及其对历史教育的影响，让我国的历史教育更多地洋溢时代气息。

“两个任务”与中国近代史 的基本线索*

中国近代史内容丰富，头绪纷繁，即令是几十万上百万言的著作也难述其详。但是，在学习、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往往又需要我们用三言两语甚至一句话去概括它的基本内容，揭示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必须承认，要简洁而准确地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科学而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难度是很大的。几十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些观点。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此文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的大讨论。通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我国史学界当时大体上形成以下共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应该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①这一观点，史学界称之为“两个过程”论。

从1980年代起，我国史学界又一次掀起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一些研究者继续坚持“两个过程”论，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新的观点或新的说法。在新观点新说法中，以下观点引人注目：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

*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年第12期，署名益夏。

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的发展的趋向。^②对中国近代史内容的这种概括，或者说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这种认识，史学界称之为“两种趋向”论。

“两个过程”论侧重从阶级斗争和政治关系的角度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揭示其发展的基本线索。“两种趋向”论侧重从社会性质的演变的角度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揭示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史学研究的成果，都能为人们认识中国近代史提供帮助，都有其学术价值。但是，如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两个过程”论所概括的历史内容较为单一，它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或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很难说它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两种趋向”论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但在中国近代，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极其有限的，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难以令人信服。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从1919年后移至1949年。如果这样来确定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区间，那么，“两种趋向”论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社会主义（包括思想和道路等）因素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深刻而重要影响，其影响的力度，比之资本主义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③笔者认为，这一精辟论述对我们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揭示其发展的基本线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论述的启迪下，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换一种表述，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两个任务”论。

无论是“两个过程”论和“两种趋向”论，还是“两个任务”论，都是在透视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后得出的结论，只不过视角与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对而言，“两个任务”论视角更加宽广，渗入度更深，因而比“两个过程”论和“两种趋向”论更科学更合理一些。或者说，“两个过程”论和“两种趋向”论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某种关系，都可以成为人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但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们又都存在着局限，而“两个任务”论则避免了这种局限，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最适宜的。

那么，“两个任务”论的优势和长处在哪里呢？

首先，它更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

中国近代史的客观事实是揭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依据。应该说“两个过程”论和“两种趋向”论都有其事实依据，但相对而言，“两个任务”论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更充分更全面。

在中国近代（1840年—1949年），以中华民族或中国人为主体的历史事件，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禁烟运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义和团运动以及以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第二类是兼具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现代化性质的事件，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

第三类是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运动，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

很明显，“两个过程”论概括和反映的是第一类历史事件（事实）和第二类历史事件（事实）的反帝反封建这一侧面，对第二类历史事件（事实）促进现代化这一侧面注意不够，而对第三类历史事件（事实）则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两种趋向”论特别重视第三类历史事件（事实）以及第二类历史事件中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侧面，而对第一类历史事件（事实）则注意不够，对第二类历史事件（事实）反帝反封建这一侧面也有一些忽视。“两个任务”论则不同，它全面关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是在概括以上三类历史事件（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而更全面更科学更合理。

其次，它更准确地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两个过程”论源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概括，但这里笔者要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本人从未讲过“两个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以“两个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我国一些史学家（一度几乎为所有史学家）的观点，而不是毛泽东本人的观点。第二，毛泽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的。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于1939年冬季。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论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阶级斗争和政治关系的角度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三，在很多场合，在谈及中国近代史时，毛泽东还讲了“两个过程”之外的其他过程和内容。这里试摘录几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毛泽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从以上引文可知，在毛泽东眼中，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不仅仅是“两个过程”，除了“两个过程”外，还有其他的“过程”和内容。“两个任务”论更全面更准确地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再次，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应该看到，“两个任务”论实际上已经吸纳了“两个过程”论和“两种趋向”论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它还反映和吸收了我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近年，通过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史学界不少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和两条发展主线，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另一个是要求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早期现代化）^④。在这些研究者当中，胡绳和刘大年的意见最值得注意。

上文已说过，早在1954年胡绳就力主“两个过程”论，但他晚年却明确指出：“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⑤

20世纪90年代，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在多种场合谈及“两个基本问题”。他强调指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⑥

以上观点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考察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最新成果”。^⑦“两个任务”论吸收了这一“最新成果”，使我们获得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新认识。

最后，“两个任务”论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历史和现实沟通和联系起来，能给人们以更多的启迪。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史学界几乎统一的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界标。80年代以来，多数研究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界标。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应划分为近代（1840年—1919年）、现代（1919年—1949年）、当代（1949年至今）三段。这说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从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分工看，可以强调二者的区分，但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在其他各种普及性的历史教育中，更注意二者的联系，往往把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为此，我们在分别研究中国近